

趙振鐸先生辭書學思想述學

汪啟明 夏 宇 吳 迪 劉 亞

題記：今年，我們敬愛的趙振鐸先生年屆八旬。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先生之學宏富博瞻，使我們這些學生終身受其蔭惠。無論從哪個角度向先生學習，我們也不能望項背。先生的學問舉凡文字、音韻、訓詁、文獻，均博大精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與辭書有不解之緣。除多年以來對歷史上的重要辭書不懈地進行研究外，從1975年起，先生便投身于《漢語大字典》的領導與編纂工作，一幹就是十六年。先生最近幾年又將幾十年治學的重要成果《集韻疏證》稿進行全面整理，並被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規劃。2002年，先生獲得辭書學會的最高獎項“終身成就獎”，這既是為先生給我國辭書學界所做貢獻的肯定，也是對先生治學成就的高度概括。謹以此文，用茲紀念。

壹 辭書學思想總論

一、辭書意義論

先生認為，編輯辭書的意義首先在於文化的積累作用。人類文化與辭書編纂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文化積累要體現的書面形式上，而其最終會通過辭書編纂人員的勞動反映在辭書上；同時辭書也為文化積累奠定了基礎，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保證。辭書的出現，滿足了人們的文化需要，“文明社會，人們更無法離開辭書”。

要瞭解辭書編輯的意義，首先得知道什麼是辭書。“辭書是工具書，但並不是所有的工具書都是辭書。”辭書不包括年鑒、表譜、手冊、索引、引得、通檢、地圖等，他們是工具書，但並不是辭書。“辭書是一種供檢索的工具書，它以詞目和解釋的形式彙集大量的知識資訊，並且按照一定的方式有規則地排列起來。”先生還歸納了辭書的三大特徵：一、從形式上看，任何一部辭書都要收列一定的詞目，並且按照一定的方式把它們編排起來；二、從內容上看，辭書收詞以後必須注釋；三、提供知識資訊的濃縮性和密集性。辭書的概念和性質決定了辭書的四大要素：收詞、釋義、解形、注音。辭書可以分爲不同的類別，最常見的分類方法是把辭書分爲兩大類：一類是語文性詞典；另一類是百科性詞典。通常我們說辭書主要指語文性的工具書，由於漢語和漢字的特點，語文性工具書又包括詞典和字典。字典以收字爲主，由於有些字的意義祇在複音詞中出現，所以字典也要收錄一些複音詞；詞典以收詞爲主，也收一些片語和短語。

（一）文化學意義

先生從中國的歷史出發，認爲辭書的產生與社會的需要密切相關。當社會不斷發展的時候，隨着時間的推移，有些前代典籍讀不懂了，就需要進行注釋。把這些注釋彙集起來，便成爲人們傳統意義上的辭書。最典型的莫過於中國古代的《爾雅》。後代要瞭解、學習前代的文化，需要借助辭書。辭書是憑藉前代文獻的注釋這種載體而存在的，它又是文獻注釋的集中體現。辭書這個載體起着傳承文化，將生產、生活中的經驗、知識和技能傳授給下一代的重要作用，成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工具，成爲一個人一生中不能須臾離開的不說話的老師。辭書的使用與人們的文化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說，一個人、一個民族的文化程度越高，越需要使用辭書。

辭書本身又是人類文化精華的再濃縮，是知識之母。它在有

限的篇幅裏向讀者提供儘量多的知識和資訊，每種辭書都應是一個資訊密集的大系統。辭書中的大量資訊不是無序地堆砌起來的，而是相互緊密銜接、環環緊扣的一個有機整體，形成一個完整的封閉系統。所涉及領域的知識，在辭書中要不缺漏、不脫節、不重複、不矛盾，並且相互呼應。作為供讀者解惑釋疑的工具，辭書也必須做到體例統一，文字通順，術語、符號規範，檢索方便。由此，它成為了文化傳遞最重要的工具。

（二）語言學意義

先生將現代各家對辭書地位的不同觀點作了分析，認為辭書學是語言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時代的發展來看，辭書總是由簡單到複雜的。語言學和辭書相互影響，其中語言學處於主導的地位。“在現代社會，特別是一些發達民族，他們民族語言的規範形成以後，辭書又將是鞏固民族語言規範的一種重要手段。”如在中國歷史上，是先有了專書的訓詁，然後纔有了收集訓詁的專書，先有了語言的辭彙研究，形成了可供歸納、排列、解釋的語料庫，纔可能有辭書的產生。從文章注釋到辭書，從詞彙學到辭書學，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

二、辭書編纂原則論

1. 繼承與創新的原則。先生認為，我國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各種各樣的辭書，這些辭書，都不是從前代辭書的簡單重複，而是既繼承了前代字典有用的成份，又給辭書帶來了新的內容。不同時代編寫的不同辭書，他們既有共同的規律，也有不同的地方，在辭書編寫中，要注意學習和借鑒。

2. 適應與反映社會生活的原則。先生認為，辭書是由於社會文化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那麼，在編寫辭書時應該首先重視的原則是緊密結合社會文化的需求。社會是不斷發展的，新的事物不斷產生，新的辭彙也不斷地產生，辭彙系統是發展變化的，但也有一些沉澱下來，成為全民的基本詞彙。同樣，辭書是搜集

和解釋詞語的，也是靜態與動態的統一，是發展性與穩固性的統一。

3. 注意歷史，重視傳統的原則。我國有豐富的文化遺產。用漢字記錄漢語中的詞有無比的優越性，歷代的文化積累，為我們留下一大批語詞類的辭書。先生提出，我們的辭書編纂，祇能在已有辭書的基礎上進行，歷代為辭書編寫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彙集了一大批資料，這些都是我們今天編纂辭書必須要繼承的寶貴遺產。

4. 收詞釋義考慮歷史文化因素的原則。先生多次強調，語言的歷史和人民的歷史密切相關，要在辭書體例許可的範疇內，結合使用那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對事物的名稱、生產活動的方式、典章制度進行釋義，或者在選擇用例時考慮歷史文化因素，這樣纔會大大增強辭書的知識性。

5. 以學術為基礎，不斷吸收語言研究成果的原則。語言在不斷地發展，語言文字學家也在不斷地進行研究，辭書總是在語言文字的研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上纔產生的。沒有語言文字的理論的指導，辭書是無法進行編寫的。就傳統的辭書而言，總是學術在先，沒有學術的基礎，不可能編出高質量的辭書。到了現代更是如此。在電腦時代，編寫詞典變成了一項百科全書式的工作，需要龐大的知識積累，不僅要對語言文字本身有深邃的研究，對民俗學、地理學、天文學，乃至相關的現當代科學技術知識的儲備、要求更是永無止境。請教業內專家、查找各種資料、建立語料庫，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最後都要經過學者型的編纂人員的理解與體會纔能行諸文字。

6. 系統論原則。先生指出：“編纂辭書有很強的計劃性，即使是一個人編一部辭書，也不是信筆而至，以意為之，而是要對所決定編纂辭書的讀者物件、內容等各個方面進行精心的設計。”不同的辭書框架設計不同，釋文程式不同，行文語體不同，每一

部辭書都是一個無比浩大的綜合工程。即使到了辭書最後定稿的時期，哪怕一個詞頭的修改，也可以引起全書的相關改動。即改目錄，改正文，改音序索引，改筆劃索引，改英文索引及相關附圖索引。所以編纂辭書要一開始就設計好體例，做好規劃。

三、辭書學科建設論

辭書在國家、社會和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但是辭書能不能成爲一門學科呢？辭書學的內涵和外延是什麼呢？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辭書作爲研究對象的學問稱爲辭書學。雖然許慎的《說文解字敘》可以是一篇有水平的辭書學論文，但這不能說就是辭書學這門學科的建立標誌。當前的辭書學仍然是一門非常年輕的學問，許多問題都還需要研究。先生提出了辭書學科建設的三大範疇，這就是“辭書學的理論”、“辭書學的歷史”和“辭書的編纂”，並且認爲這些內容都還在建設階段，辭書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

關於辭書學的地位，一般認爲是語言學的一個部門，現在隨着專科辭書的出現，有人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爲應該從語言學中獨立出來，成爲一門新的學科。先生認爲，辭書所收的是語言中的詞，“辭書学的核心是編纂辭書的工藝，這些工藝以語言學理論爲指導”，“辭書學涉及的問題很大一部分都和語言學特別是詞彙學有密切的關係”，“它是從解釋和編排的角度來處理語言詞彙”，“它祇能夠從屬於語言學。”

貳 辭書學思想分論

一、收詞論

收詞（字）是辭書編纂應該首先解決的問題，它是辭書編纂的第一道程式。哪些詞（包括收字，單指字典時例外。下同）該收，哪些不收；傳世典籍、出土文物、方言、外來詞、新詞等該

如何收錄；異體字、異形詞該怎樣清理；字典收複音詞的標準是什麼，等等，這些問題所涉及的許多細節都要考慮得清楚明白。辭書收詞是否得當，直接關係到一部辭書的質量問題。

對這個問題，先生做了深刻的論述。辭書收詞的原則是由他們的性質和任務決定的，大型辭書要考慮到辭書收詞的歷史繼承性。古代典籍中的詞可收得寬泛些，近現代新出的詞要嚴些。要堅持辭書收字的典範性和描述性原則，在遇到具體問題時從語言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先生舉例說，《漢語大字典》以《康熙字典》為底本，在此基礎上擴大了收字範圍，收錄了《康熙字典》中漏收而又見於傳世典籍中的字，如《墨子》中的“僂”字；元、明、清一些文學作品中的字，如“跔”字；秦漢時期的竹簡、帛書，漢代以來的碑刻文字，晉以下的抄本，歷代的出土文物，祇要音義明確的字，字典也應該收；至於有影響的方言字和日本字，字典也要收錄，如四川方言“跋”字和日本字“畑”等等。

異體字的出現是由漢字本身的特點決定的，異體字的清理是大型辭書的一項重要任務。先生提出的方法是：首先要確定正體字。通行的楷書繁體字最有資格作為一組異體字的正體，如《簡化字總表》《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辭海》等收錄的簡體字後面的括弧內的繁體字都是通行的楷書繁體字，應選為正體；沒有簡體字的異體字除以上三部辭書外，還應以《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所列正體字為正體；以上書中沒反映的異體字，以文籍中通行習見的為正體；篆體隸定中的幾種形體，以通行的楷書繁體字為正體；形體差異大的異體字以《辭源》《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三本辭書所取字形為正體字，沒收的也以他們所取的字形為正體字；冷僻罕用字，以有用例的為正體，沒有用例的應對歷代辭書中的材料分析後再作決定。總之，異體字的情況很複雜，遇到具體情況要用不同方式處理。

先生認為，字典收錄一些複音詞，是由於漢語的一個字有時並不代表一個詞，字典在收字時應該處理好字與詞存在的矛盾，字典不是詞典，某些單字的義項祇出現在複音詞中，那麼祇需收錄這些複音詞便可，《漢語大字典》在收列複音詞時祇要單字有義項就不必在單字下再帶出複音詞，這一點比《康熙字典》和《中華大字典》做得好。

又如外來語詞彙的收集。我國從漢代以來便有外來詞傳入，“葡萄”一詞最為典型，明朝李時珍寫《本草綱目》時便已經不清楚它的來源了，“南無”是一個佛教用語，宋人已經不懂得它的意思了。因而需要對其進行解釋，也應該收入辭書中，纔不至讓後之學者不能溯源討流。

二、釋義論

釋義是辭書編寫的關鍵，是辭書的靈魂所在，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部辭書的優劣。

先生認為，辭書釋義的原則是要求簡潔和準確，要注重詞義的歷史性和概括性，尊重語言事實，從語言的社會性出發，用語言學的觀點、歷史的觀點來解決大型辭書的釋義問題。應該當分則分，當合則合，既注意釋義的“圓”，又注意釋義的“專”；既注意釋義，又注意排序。嚴格從語言事實出發，在遇到具體問題時還要具體分析。在涉及釋義的諸多問題上，如建立義項、釋義方式、義項排列、多義詞的解釋、造字之義和用字之義的辨別、本義和引申義、假借義和通假義的處理、異體字、名物字的解釋等諸多問題上，先生都作了論述。

先生認為，詞典裏詞的義項，應該是詞的理性意義，詞義要有概括性。雖然義項歷來沒有一個被公眾認可的定義，但是義項還是容易被感知的，辭書的編纂者完全能夠通過概括、綜合、分析來歸納出義項。確立義項的方法有三條：首先要充分利用前代辭書，其次要佔有大量的語言材料，再次要對語言的用例概括分

析。在利用前代辭書建立義項時，增刪義項一定要仔細推敲，有憑有據。

在字典釋義的諸多問題中，通假字的釋義是字典釋義的難點，先生在《字典論》一書中，用了整整一章來談字的通假義。首先，可以通過通假字的性質來辨認通假字。通假字是一個歷史平面上用字的分歧現象，它與那個時代的讀音相同或相近有關，通假字還必須有用例或其他證據。其次，必須把通假現象與假借字、古今字區分開。許慎解釋假借是“本無其字，依聲托事”。而古今字是指古代字少，一字多義，後來由於交際需要，創造了後起區別字，三者雖然各有特點，但在辭書釋義時有交叉重疊的地方。再次，處理通假字要注意吸收前人成果，漢代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通假現象，清代學者的成果也要注意吸收。最後，通假現象要嚴格從語言事實出發，有無用例是確定通假的重要標誌。通假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由於個人認識不同，解釋的時候存在分歧。

先生認為，舉例和釋義有密切的關係，它是佐證釋義的重要手段。有位外國學者形象地比喻為“一部沒有例句的詞典祇是一具骷髏”。由於辭書裏面的義項具有概括性，有時詞義不易理解，這時舉例更為重要。所舉書證要和義項一致，還要盡可能使用始見書。

三、解形論

漢字是一種形體結構複雜的表意文字。漢字發展到今天，字體經過了多次變化，加上字的孳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漢字體系。因此，字典有必要分析漢字的結構，說明它的源流演變。

先生在總結前代字典編纂中關於字典解形部分的經驗教訓後，認為在大型字典中，解形部分應該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應將字形的解說作為一個獨立的部分，而不併入有關義項的釋文中。同時，他還認為字典的解形一般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古文字

形體的收列，一是字形結構和它的源流演變的說明。在解形時要做到選字合理，解說準確。由先生主持編纂的《漢語大字典》正是這樣處理的：在楷書字頭下面收列能夠反映字的形體演變關係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形體，並且簡要地說明它們的源流演變。這樣做不僅可把一個漢字的形體演變情況清楚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而且在古文字形體之後所附的簡明說解為讀者進一步認識一個字的形體結構和源流演變提供了方便。此外，先生還認為，楷書字形發生了各種變化，有些字還經歷了複雜的演變過程，也應該對此進行研究，這樣可以大大豐富字典解形的內容。

在選取古文字形體時，先生認為，應該精選具有代表性的、能夠反映造字本源和字的源流演變的古文字形體，並且要注意它們的特點。同時也要注意收錄《說文解字》以外的古文字形體。他還特別強調古文字形體的收列一定要注意材料的翔實性，不主張使用轉手材料。這一觀點對於字典的編纂很重要，但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比如《康熙字典》在釋義時總是先引《說文解字》；《中文大辭典》雖在單字下面收列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各種形體，但他們多利用第二手材料，存在不少問題。至於那種在古文字中祇有一個形體，而後世分化為幾個不同音義的字，應該據實際情況分別收錄，並且所收列的那個字在原文獻中的意義應該和楷書的字頭相應，切忌張冠李戴。

在對字形結構和源流演變進行說解時，先生認為《說文解字》是一部必需的參考書，但不可盲從。應先對材料謹慎鑒別，去偽存真，方可加以利用。同時還應慎重地吸收新的語言研究成果，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漢字的結構，力求作到古今結合，既符合語言發展規律，又能客觀真實地反映文字的源流演變情況。先生這種科學公正、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值得古漢語辭書編纂者認真借鑒。

四、辨音論

注音是辭書編纂的又一重要問題，任何辭書都離不開它。《說文》中的“从某，某聲”、“讀若”、“讀與某同”就是表示字音的。反切發明之後，字典的注音採用反切方式。而《康熙字典》除大量使用前代韻書的反切之外，還在反切之後標注直音。中文拼音方案公佈以後，辭書的注音則採用拼音方案了。但是，正如明代學者陳第所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毛詩古音考自序》），先生從辭書編纂工作的實際出發，就反映字音的古今變化關係，對字進行合乎規範的標音，在總結前代字典注音得失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關於注音的總原則及方法，先生認為“大型字典有重點地、適當地反映漢字字音的歷史演變和發展的注音原則無疑是正確的”。字音與字形、字義相互協調的問題，先生主張採用三段注音法，即注音分現代音、中古音、上古音。現代漢語以具有規範性的普通話讀音為準。中古漢語以《廣韻》、《集韻》為主要依據，注出反切並標上音韻的地位。上古漢語則因聲類和聲調的研究存在不少爭議，而主要標出韻部，以近人歸納的三十一部為主要依據。這樣根據每個字的歷史面貌注釋其今音、中古音（反切及聲韻調）、上古韻部的方式，能更好地反映古漢語的客觀面貌，給讀者一個完整準確的概念。

先生對字典注音問題的認識有幾點值得注意：一、先生認為，“字音的標注應注意漢語和漢字的特點，注意字的形、音、義三方面的聯繫”。漢字是形音義的結合體，音隨義轉，義以音生，義既寄於音又托於形。由於字的形、音、義的變化發展不平衡，彼此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因此，確定一個字的讀音不能夠單純依據音切資料，而應該多方取證。二、注音工作既要注意正確掌握和運用語音演變規律，又要注意語言的社會性。語音要受社會的制約，按照音變規律類推出來的音，一定要服從普通話語音

結構規律的支配。在對字進行注音時，不能因為類推而出現普通話裏面不存在的音節。因此，遇到這種情況時，趙先生建議標注一個聲韻相同而聲調有別的音。這種實事求是的處理方式便可將漢字的古今音完美地貫通。此外，先生還強調：“字音的標注不是一勞永逸的，這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在字典的修訂工作中也要考慮字音的修訂。”先生在字典編寫成書後，有暇進行字音的審訂工作，寫了一些短文，如認為古代西南少數民族“冉駹”的“冉”不音“rǎn”。又如“枳”和“稭”兩字有異體關係，注音應統一。可見，在注重語音共時研究的同時還應特別注意語音的歷時研究，既注意語音的發展變化歷史，又注意語音的現實情況，真正將“古今兼收，源流並重”的辭書編寫原則貫徹到底。

三 辭書學史論

我國的辭書編纂的歷史源遠流長，從古代的繁榮到現代一百年間的衰落，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重新發展，辭書編纂進入了一個全面繁榮的時期。面對先輩們為我們留下的眾多的辭書，我們祇有瞭解古代辭書的編寫情況，總結編纂的經驗教訓，從中汲取有益的東西，纔能編出更多高質量的辭書，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和古籍整理做出貢獻。

為此，先生以他親身參與《漢語大字典》的編纂工作體會出發，大致梳理了辭書發展的歷史，寫了一系列辭書學的專著，包括《辭書學論文集》、《古代辭書史話》、《辭書學綱要》和《字典論》等專著，還有關於《方言》、《爾雅》、《釋名》、《集韻》等辭書的多篇論文。

一、辭書史的研究為今天的辭書編纂服務

辭書史的研究在辭書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要經歷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發展階段，我們祇有總結過

去的經驗教訓，面向今天的辭書編纂，纔能推動未來辭書編纂的繁榮與進步。因此，對這門學科的歷史發展演變進行追溯，學習和研究已有的辭書及相關學術著作，揭示辭書發展的規律，顯得十分重要。

研究古代辭書史就必須對古代標誌性辭書進行研究。古代的辭書眾多，質量也差參不齊。要從眾多的辭書中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書，需要下功夫來取捨，這必須是具備專業素養的學者纔有能力做到。在《古代辭書史話》一書中，先生精心挑選了古代最重要的幾部辭書，採取以點帶面、點面結合的方法勾勒出了古代辭書發展的歷史，總結出了這些辭書在編纂中的得失。

例如，總結《爾雅》在辭書編纂中的得失時，先生認為《爾雅》的釋義方式“在今天的辭書編寫中仍然沒有失掉它的意義，祇是更完善更細密罷了”，但是《爾雅》中的互訓、遞訓和聲訓三種解釋詞義的方式已經被淘汰了，所以在辭書編纂中不能再用這三種釋義的方式，同訓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方言》雖受到《爾雅》的影響，但是二者之間還是有區別的，《方言》“主要目的在於明詞語在時間和地域上的差異”。先生對揚雄搜集材料的方法表示贊同，認為這是我國歷代方言調查所採取的主要方式之一，對我們今天進行方言調查和方言詞典的編纂都是大有裨益的。先生還充分肯定了《說文解字》在部首編排上的創建和許慎對“六書”的正確認識，肯定《說文解字》在釋義時對不好解釋的字採取引用例證來解決它，這是最早的辭書舉例釋義法。《釋名》是聲訓詞典，先生從辭書編纂的角度探討了聲訓在《釋名》中的重要作用。在總結古代韻書編纂經驗時，先生選取了《廣韻》作為代表，認為它對保存古代文獻材料和中古音系，並以此為基礎上推上古音，下貫近代音，有重要的作用。《佩文韻府》是詞藻和典故的彙編，它在編纂上的獨創之處就是“以詞語下字相同來歸併詞語的逆序詞典，這在辭書史上史獨樹一幟的”。《康

熙字典》在辭書編纂的經驗中有許多可取之處，如部首編排，體例，字典前面的凡例、總目、檢字、辨似、等韻各一卷，這些對於今天的字典編纂都有借鑒作用。關於古漢語虛詞詞典的編纂，先生以《經傳釋詞》為代表作了分析，認為王引之發明的虛詞條例和規律較其他學者多，採用的方法更嚴謹。最後先生總結了《經籍纂詁》在辭書編纂中的經驗，認為它在義項的豐富上值得肯定。

二、辭書史與語言學史相互依存，相互為用

古代辭書並不是為語言學的目的而編寫的，但其中卻反映了我國古代學者已有的進步語言學思想。對古代辭書史的梳理也是對古代語言學思想的梳理，辭書史和語言學史是相互依存的。對古代辭書史的介紹，先生緊緊抓住了二者的相關之處，以一個語言學家的視角來審視辭書發展的歷史。在《古代辭書史話》中具體介紹每本辭書“一般包括編者、編寫年代、編寫方式、基本內容，它從前代辭書吸收了什麼，有什麼特色，對後世辭書有什麼影響等等”。這些內容既是辭書史的內容，也與語言學相關。既然辭書史的考證涉及了語言學的問題，我們可以把它的成果引用到語言學的研究當中，如《方言》中揚雄把“不同意義的詞都歸入到同一詞條而注明它的方言來源”來編纂辭書，比古代許多國家都要早。《說文解字》首創“部首檢字法，解形、釋義、注音、引證各方面具備的規模。而西方到十六七世紀纔有人作這方面的工作”。“《釋名》對事物的命名由來雖然帶有很多的主觀猜測成分，但還是有其合理的成份。”在語言學史上，《釋名》正確提出了事物得名由來的問題；還根據發音部位對語音進行了分析描寫。這些不僅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甚至在世界語言學史也居於領先地位。

三、對一些有爭議問題的獨特認識

在對古代辭書的研究中，有些問題爭議較大，先生能夠從眾

說紛紜中獨闢蹊徑，而他的創見卻又是使人信服的。如關於《爾雅》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先生認為“古書不一定出自一人時，可以設想，西漢初年就有個《爾雅》的本子，後人不斷增加”。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爭論是《毛傳》抄《爾雅》，還是《爾雅》抄《毛傳》，先生認為“不存在誰抄誰問題，它們都是根據前代故訓”。《方言》的作者也是人們一直爭論的問題，先生認為“在沒有足夠證明《方言》不是揚雄作的之前，把這部書的著作權歸給揚雄是恰當的”。關於《釋名》，有的學者認為它是“一部主觀的，唯心的訓詁理論，從唯物的語言學觀點來看，它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並不佔有重要地位”。先生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公允的”，“從語言學的歷史發展來說，在科學的詞源學產生以前，人們對詞源的研究都經歷了這樣一個主觀猜測的階段”。對書的評價要放在當時的具體發展歷史中來看。對《經典釋文》是不是辭書的看法，先生根據判斷辭書的標準主張不應把它看成是辭書。關於《切韻·序》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先生詳實嚴謹地論證了“《切韻》一書要解決的四個問題是：（一）校正方俗音；（二）嚴格規定切語用字；（三）評論各家韻書得失；（四）確定正音規範。確定正音規範是中心”。

肆 辭書實踐論

一、幾部重要辭書的編纂實踐活動

除了系統而全面的辭書學理論構建，先生還先後參加過《漢語大字典》、《成都大詞典》和《四川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通過辭書的編纂實踐，更豐富了他的理論。

（一）《漢語大字典》

《漢語大字典》是先生的辭書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集中表現。

先生從 1975 年起，便參加到《漢語大字典》的編纂工作中，並且受託擔任常務副主編之職。當時徐中舒先生已 77 歲，在此後的字典編纂工作，比徐先生小 20 歲、正當年富力強的先生便承擔了四川部分主要的組織和審稿工作。

《漢語大字典》是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提出，由周恩來、鄧小平批准組織編寫的，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是為了改變“大國家小字典”的現狀而實施的。先生提出：“資料建設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字典能否達到高質量的基礎。”從 1975 年起，由四川、湖北兩省參加了這項重要的工作。當時僅有一個領導小組，確定體例，組織編輯隊伍，而且用兩年的時間做了七萬多張卡片。最早有李格非、冉友僑先生等參與其事。1979 年 11 月，根據組織上的安排，徐中舒先生出任《漢語大字典》主編一職，先生與李格非則為常務副主編，其他副主編有冉有僑、朱祖延、李運益、晏炎吾等四人。先生負責四川方面日常的編務工作，徐先生則發揮所長，對古文字的字形工作做了許多重要的指導。到 1985 年 1 月，徐先生因身體的原因，沒有能繼續參加《漢語大字典》的工作，這樣，四川方面前期的資料工作和日常的編輯工作以及整部《漢語大字典》後期出版前的終審工作主要落在了先生身上。在《漢語大字典》十六年的編纂過程中，先生正好是將最年富力強的時間投入大字典的編纂工作，這是先生用自己的辭書學理論指導實踐，並從中總結經驗，再上升到理論的重要時期。這也就是先生近年來出版《辭書學綱要》《字典論》《辭書學論文集》的實踐基礎。

（二）《四川百科全書》

《四川百科全書》是先生辭書學理論的又一重要實踐活動。這部書歷時三年，最早有關方面要先生擔任主編一職，先生以為“主編”要“主”又要“編”，自己事務較多，就婉謝推辭了。先生認為，主編不能虛設，辭書編纂工作尤其當如此。他雖然祇擔

任了副主編，但對編纂工作仍然悉心指導，認真審稿，仔細修改，保證了這部書的質量。

（三）《成都大辭典》

這也是先生辭書學理論的又一重要實踐活動。先生擔任編審委員會副主任。寫了“成都概況”，審讀了“成都方言”的書稿，並多次在有關編寫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二、辭書隊伍建設

先生認為，好的辭書離不開好的編纂人員隊伍。辭書的編纂人員主要由兩方面構成，一，出版社的編輯，他們是編纂隊伍中非常穩定的部分；二，借鑒中國歷史上許多大型辭書都是國家組織力量進行編寫，先生提出了辭書編纂隊伍的專業化問題：“一部大型的辭書，僅靠出版社的力量，即或是有很強的力量，也是難以完成的。”不僅要專業化，還應該依靠集體的力量。“集體的力量來自社會，動員社會力量編輯辭書是是一項行之有效的辦法。”在先生領導《漢語大字典》的過程中，這兩種力量，既有數量不足的問題，又有質量亟待提高的問題。先生提出，數量不足，可以發揮學校的作用，即培養辭書學方面的研究生來解決，這也是一個行之有效辦法。當時四川大學專門收了一屆字典學研究生，他們後來都成為《漢語大字典》工作的重要編纂骨幹。通過出好一部辭書，帶出一支隊伍，這是先生在實踐中總結出了一條重要經驗。這個隊伍可以用培養研究生的方式，“但這不是唯一的方式”，還可以通過從社會上招收的方式，在實踐中加以培養，《漢語大字典》從社會上招收錄用的人員，後來相當一部分都成為辭書學界的重要力量。

三、辭書的修訂工作

先生認為，辭書定稿後，修訂的工作應該馬上進行。大型辭書往往動輒有上百人參加。這些人水平參差不齊，對編寫條例領會程度不一，甚至認真的程度也不是一樣整齊的。所以，時時修

訂辭書是他辭書學理論的一個重要觀點。這是因為：一，編寫者無論多麼地小心，多麼仔細地修改，想畢其功於一役，而不出現任何錯誤是不可能的。政府組織多人完成的大型辭書更是如此。二，時代在前進，社會在變化，對於同樣的詞，有不同的看法。詞義也有擴大、縮小和轉移等情況。三，新詞不斷地產生，新知識不斷地更新。所以，出版界曾被人譏之為“無錯不成書”。辭書也概莫能外。那種辭書一旦出版，隊伍就解散，即便掛一個牌子，也名存實亡的情況，於一部辭書無益，對整個辭書編纂事業也是有害的。

能否及時地進行修訂，是決定一部辭書生命力長短的重要一環。先生提出，修訂不是說時時修訂，全面修訂，而可以是局部的，既可以在保持原有面貌不改變，對原有的錯誤進行糾正，也可以對原有的體例做一些改正。“辭書本身是一個系統”，在修訂中，注意辭書各個組成部分的相關照應是非常重要的。先生還具體提出了辭書修訂的幾項重要工作，一是要有一支隊伍，二是要有一個機構，三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四是要有一個規劃。這些都是辭書出版後應該着力加以注意的。

國外的辭書一般都是兩年就更新一次。從理論上講，詞典應該3—5年更新一次。在修訂中要時時注意新的研究成果，時時更新。要處理好穩定與修訂的關係。《新華字典》45年間修訂了8次，平均每五六年修訂一次，在我國的字典界中可謂絕無僅有。修訂是保持字典詞典青春活力的唯一法門；但是修訂絕不等於新編，必須吃透原來的編輯意圖，保持它原有的特色。可以在原來的特色基礎上加以發展，但不能不顧原來的設想，實施另外一套方針——修訂者沒有權利這樣做。可惜有些字典修訂得過了頭，修訂者過分熱心，不願多花力氣去熟諳原書的底細，有時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其實他並非反對原來的意圖），祇是匆促地憑着自己的學識或習慣大刀闊斧地操作，這是修訂字典的大忌。這

樣做，還可能把正品修訂成廢品。

《漢語大字典》出版後，社會各界提出了不少的建議與意見，而編纂處雖名義存在，但實際上沒有專門的班子負責修訂，導致了目前《漢語大字典》修改滯後，先生于此十分焦慮。他認為，這部書已經出版了十多年，應趁還有一些編寫者健在的情況下，將全面修訂提上議事日程。

五 結 語

先生的辭書學理論既繼承中國歷史辭書編纂的優良傳統，又注重吸收國外先進的辭書學理論，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挖掘出了許多新的東西。無論是在理論的建構上，還是在具體的方法如收詞、釋義、解形、注音等具體方面，都為我國的辭書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對於當前辭書學界面臨和提出的問題，先生都有自己的觀點和思考，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不僅為今後辭書編寫及修訂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也為促進漢語及漢字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主要參考文獻〕

趙振鐸：辭書學綱要 [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

趙振鐸：字典論 [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趙振鐸：辭書學論文集 [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趙振鐸：古代辭書史話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汪啟明 夏宇 吳迪 劉亞 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 郵編：610031）